

热历史

一池河东盐 半部华夏史

——从文物遗存看古代河东盐池的开发与管理

李百勤

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盐湖,地处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的山西运城盐湖都是十分独特的。运城盐湖古称“渤澥”,因地处河东地区,又称“河东盐池”。作为中华先民开发最早的盐池,河东盐池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对国家贡献极大。

中国古代主要有三种产盐方式:东南沿海人们煮海成盐,称为海盐;西南川滇地区人们凿井取卤,熬制成盐,称为井盐;相对海盐和井盐,通常人们说的池盐,是经日晒风成,在大自然温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生产方式最为省力。渤澥中的卤水平地流出,夏季气温达到38摄氏度时,卤水中的氯离子与钠结合生成氯化钠,就是食盐。

古人为河东盐池造了一个字,曰:“鹽”。《说文解字》说:“鹽,河东盐池,袤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戊子,至于鹽”,说的就是河东盐池。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可能通过猎食动物获取身体所需要的盐分。当中原地区有了原始农业,人们对粮食为主要食物后,盐对人们显得尤为重要。河东盐池周边数千平方公里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带,仅运城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多达200余处。

自夏代开始,人类历史进入青铜器时代。夏朝曾建都于安邑,就在盐池附近。夏代的东下冯遗址,在盐池东部10公里之内,这里海拔比轅村遗址略高,印证了文献中对夏禹时代雨量增多、盐池水域扩大的记载。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大型遗址与盐池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商代,人们在东下冯修建了城堡,城内发掘出大片储盐的盐仓,这是关于商代盐池开发利用的重要发现。河东盐池位于商王朝都城之西,甲骨文称这里为西土。这里的盐池也被称为“卤”,是这片土地的显著标志,故“西”字与“卤”为同形。

西周王室实行分土封侯的政治制度,周武王把自己的弟弟封在盐池的西边,称郇侯。郇侯就是为周王室管理盐池的。郇城在运城市盐湖区西曲樊村,这里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盐窖。窖穴为圆状袋形,开口直径0.6米,底部直径1.2米,深1米左右。

商周之际,大批戎人进入今晋南地区,并建立了国家。近年考古学家在山西翼城县大河口村发掘出霸国墓地,这里距河东盐池数十里



▲工人在运城盐湖铲盐 记者 薛俊 摄

之遥,当时,霸国参与了盐池的生产活动。霸伯墓出土了一件青铜簋,上边的铭文记述了周王室派并叔到霸国协商贡盐事宜,赏赐给霸伯鬯、丹、虎皮的事情。霸伯把这件事铸到铜簋上,以显示荣耀。

春秋时期,晋国兼并了周边的小国,盐池归晋国所有。晋昭公六年,大夫戎生以盐到今安徽一带的地方换取铜,为此,戎生铸编钟一套,在铭文中记述了这件事。当时,河东盐池是自由采捞的。鲁国有个贫士,名顿,他向陶朱公(范蠡)询问致富之道,陶朱公告诉他到西河(今晋南一带)牧羊可致富。顿到猗地,发现池中可采捞盐,《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以盐池起……与王者埒富。”

战国时期,河东盐池归魏国,魏国在盐池北边置盐氏邑,经营管理盐池。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在河东郡治安邑设盐官——均输长,管理盐池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东汉因之。

北魏太和十一年,置南安邑县(在今山西运城市),设盐官驻南安邑。

唐代,河东盐池发明垦畦浇晒法,又称五步产盐法,大大提高了盐池的产量。为了加强盐池管理,在盐池周围开挖壕沟,并围以樊篱。唐代以前,人们奉“鹽宗”为河东盐池之神。唐代宗封河东盐池之神曰“宝应灵庆公”,在安邑县城南建祠奉祀。

宋代分河东盐池为东、西两池,于安邑和解州分别置盐官——榷盐制置使,封东池盐神为“永泽资宝王”,封西池盐神为“广济惠康王”,并在唐代壕篱的基础上修筑了矮马短墙。

金代设解盐使司,置解盐使、解盐副使,管理河东盐务。元代在平阳设都转运盐使司,管理河东盐务,都转运盐使为从三品,这是历代盐官最高的品秩。在安邑城南圣惠镇置盐场官。元至正十六年,运盐使那海俊德在盐池中部北岸修筑凤凰城,城内置运盐使司,管理盐务。在运城南卧云岗修建池

神庙,奉祀“宝应灵庆公”。

明代承袭元制,置河东都转运使司,管理盐池的东场、西场和中场。明代继承了盐池的垦畦浇晒法,在盐池设立畦户,专门经营盐池的生产。为了防止湖水进入盐池,冲淡卤水,影响盐池产量,在盐池周边修筑了72道堤堰,设有专人管理,称为堰户。在各地设立盐户,经营盐的运输和销售,并将人头税加入盐税中征收。畦户、堰户和盐户统归盐运使管辖,盐运使为正五品衔。明代正德年间,在宋代矮马短墙的基础上修筑了盐池禁墙,周匝长度为百十六里。最初在北墙中部开设一个禁门,后因生产销售不便,于北墙东、西各增设一个禁门,东禁门曰“育宝门”,中禁门曰“佑宝门”,西禁门曰“成宝门”。禁墙内由缉私营管辖。禁墙外归掣制署管辖,掣制署置游击将军,管理3个巡检司,即圣惠镇巡检司、长乐镇巡检司和盐池巡检司。运盐道上二里设一铺,归巡检司管辖。

自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各州、县设学,生员各有定额。明正德八年,河东运盐使在运城创立河东书院,供盐官和盐商子弟就读,参加科举考试。明清两代,盐学考取进士多达百余人。清代乾隆年间,山西布政使编修《河东盐法备览》,分盐池、运治、职官、渠堰、坐商、运商、引目、课额、律例、学校、奏疏、艺文十二目,记述了历代对河东盐务的管理。正在此时,将河东盐池实行民运民销,按“摊丁入亩”的办法征收盐税。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板荡,河东盐池生产凋敝。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设立盐业化工管理局,除生产食盐外,综合开发利用盐池资源,生产多种化工产品,为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如今,运城这座中国历史上因盐运而设立的城市,不断加大“退盐还湖”生态修复力度,把盐湖从矿区变为生态保护区、旅游目的地,河东盐池依旧源源不断地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着前行的能量。

(《中国文化报》)

名人轶事

文天祥:舍生取义

□王爱军

宋端宗景炎三年冬,文天祥在抗元过程中兵败被俘。元将张弘范屡次劝他投降,还令他写信招降另一抗元将领张世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母,还教别人背叛父母,可以这样做吗?”之后他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一诗,张弘范在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知道文天祥不会屈服,便不再逼迫他。

第二年,崖山海战失败后,张弘范又劝文天祥说:“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心意,像侍奉宋朝皇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就不会失去宰相之位。”文天祥含泪说:“国家沦亡却不能补救,作为臣子,死有余辜,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呢?”张弘范无奈将他送往大都。元朝廷对文天祥也是百般威胁利诱,许他以宰相高位,都被他拒绝。

文天祥被囚禁三年之久,所居环境极其恶劣,他在《正气歌序》中描述说:“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虽是如此,他依旧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正气歌》,表明自己的志向:“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文天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他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后来忽必烈还不死心,亲自出马,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我文天祥得到了大宋的恩泽,做了宰相,怎么会服侍第二个姓的君主呢?希望赏赐我一死,我就满足了。面对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忽必烈无计可施。1283年1月,文天祥面朝南方,在柴市从容就义。

在历史上,文天祥是颇受儒家知识分子推崇的“气节”之士。气节首先是一种“临大节而不苟”的正气,就是当民族或国家遭受外敌入侵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临危不苟、威武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生命固然足惜,但还有比生命更值得珍贵的东西,这就是道义,孔子将其描述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这种浩然正气所根植的底蕴是志向。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人身处绝境或关键时刻,能够坚守志向而不服屈,不苟且偷生,而是慷慨赴死,成仁取义,就是因为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志向作为内在的支撑。(《天津日报》)

古代“识大体”的重要性

□喻清录

在古代,“识大体”是最重要的思想素养。封建官僚“识大体”的内涵广泛,主要是两点:其一,明白尊卑之位、君臣之别,君为尊,臣为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也。其二,遵循主流道德规范,为君尽忠、为国捐躯,是最高精神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也。

《资治通鉴》中对两汉、魏晋人物的记述,充分证明了“识大体”的重要性。

汉高帝元年,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刘邦大将韩信连战皆捷,占据了黄河下游之地;而刘邦则屡战屡败,连老爹、老婆都成了俘虏,急召韩信救援。韩信这时却奏请刘邦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代理)王以镇之。”刘邦览奏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你)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蹊(轻踩)刘邦足,附耳语曰:“汉方不利,怎能禁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刘邦省悟,复伴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立韩信为齐王。韩信拥兵自重,这一刻已经埋下了日后被杀的祸根。

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操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率七支军队讨伐关羽于樊

城。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数丈,七军皆没,于禁“穷迫,遂降”,拘押荆州狱中;庞德“为(关)羽所得,立而不跪,羽杀之”。十月,孙权袭取荆州,“释于禁之囚”;曹魏黄初(曹丕年号)元年正月,曹操薨,曹丕继位,孙权送于禁归魏。曹丕鄙于禁为人,令诣郾城谒高陵(曹操墓),但“先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于禁降伏之状”。于禁看见图画,“惭恚发病死”。

曹魏景元三年十月,大将军司马昭“专断国政,欲大举伐(蜀)汉,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钟会劝之(赞成)”,司马昭乃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次年八月,钟会“军发洛阳,陈师誓众”,与征西将军邓艾分兵伐蜀。钟会“内有异志(称王称帝)”,灭蜀后杀邓艾,“独统大众,威震西土,遂决意谋反”,并与蜀汉降将姜维密谋,妄想“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然而阴谋败露,魏军将士哗变,“众格杀姜维,争前杀钟会”。伴随着身首异处,钟会的黄粱美梦终于破灭。

韩信、于禁、钟会皆为一代名将,他们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警示后人,做官必须“识大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国家。(《洛阳日报》)